

# 关系空间在村庄非农化过程中的实践逻辑

## ——基于珠三角L村中关系建构过程的社会学研究\*

周伦府 黄嘉文 方兴和 何志濂 官素霞\*\*

( 中山大学, 广东·广州 51006)

**内容摘要:** 基于对珠三角L村的田野实证调查, 文章提出“关系空间”的概念思路, 指出, 在一个“流动的”的非农化社区生活中, 关系作为一种变迁的空间形式与过程, 导源于既定的社区结构及变迁环境, 构成了整个社区架构的运作, 其中包括了在社区结构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个体间为利益演出的相互冲突与相互策略的行动取向。据此, 产生于实体空间变迁的关系空间, 在村庄非农化过程中的实践与建构是一个流动式的变通过程; 其在社区生活层面呈现出一种“流动性”与“适应性”逻辑, 在个体行动层面呈现出一种资源配置的“有限排他”逻辑。

**关键词:** 关系空间 非农化 流动性 适应性 有限排他

### 一、引言：空间、关系与社区研究

空间(space), 作为一种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 人们常把它与时间(time)放在一起考察社会结构的转变。然在传统研究里, “时间取向”占据着主导地位。随着社会理论研究的“空间转向”(何雪松, 2006), “空间”研究在社会学领域里也变得越来越凸显。其实, 思想大师米歇尔·福柯(M. Foucault)早有断言: “空间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东西。”“当今的时代或许应该是空间的时代。”(Foucault, 1980: 63、70) 在社会学视角里, 空间是作为社会历史建构的产物, 不能把之化约为物理学、几何学意义, 它被赋予了经济、社会、文化上的意义。由此, “空间不能不参照社会实践加以定义”, “在一般层次上, 也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界定空间是什么”(卡斯特, 2006: 383)。空间具有社会性, “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 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 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列斐伏尔, 2003: 48)”, 故“社会空间(social space)”,

---

\* 本研究受到了中山大学人类学马丁堂奖学金项目(项目序号 08105)及中山大学本科生科研项目(项目序号 19)的资助, 特表感谢!

\*\*周伦府,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 E-Mail: zhoulunf@mail2.sysu.edu.cn ; ADD: 广东省广州市大学城中山大学东校区至善园4号 邮编: 510006

乃如其名，犹如列斐伏尔(Lefebvre, 1991: 30) “(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所言，亦如布迪厄(2001) “场域与资本”所论。显然，空间已界定为一种关系的体系。

在当下时空变化日益加剧的社会里，若单纯以关系来代替空间，这不免有点强盗，但关系的确是空间的核心，甚至可以说，社会空间的实质就是社会关系。因而，吉登斯(1998)在对空间的分析中引入了场所、区域化和在场可得性等概念，以便将时间、空间、人们的社会行动等融合在一起。他通过严格区分地点(place)与场所(locale)的概念指出，地点的意涵只限于纯粹的物质环境空间，而社会行动是具体的情景(setting)中发生的，以地点为中介，也即人们的互动始终离不开地点；而“场所”是一种特定的物质区域，是互动背景的组成部分，它具有明确的边界，也是限定互动情景性的重要因素。进而，吉登斯又提出了“区域化”的概念来深入分析人们日常生活的例行化行为(routinization)，可以说，这样的概念带有社会行动跨越时空进行结构化的内涵。由此，他在面对现代社会的时空交汇(time-space convergence)现象时，又采用了“在场可得性”概念来解释人们的互动行为。看得出，吉登斯的研究及解释是层层推进，在他的互动的“在场可得性”里，人们可以跨越无限时空距离，实现其共同在场，以实现在具体情景之中的沟通和互助；他亦认定，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特有动力。<sup>①</sup>吉登斯所谓的“时空分离”即指跨越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亦为现代社会时空变化加剧过程中社会关系的整体。可见，吉登斯对“空间”的阐释所赋予的现代意义，核心也就在于社会关系。

社会关系本为社会学中传统的研究课题，然在过去“对正式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关注，特别是对这些研究领域概念精确化和可操作化的刻意强调，含义广泛而又多少有些模糊的社会关系受到了明显的忽略(孙立平, 1996)”。现在，“空间”的现代意义阐释又把研究指向了传统，正所谓“变不离宗”。虽然“空间”有着“关系”趣旨，但是“空间”本身所具有的物质与社会复合性及形而上意义，还是难以用“关系”来对“空间”作出清晰的界定。因此，鉴于本项研究

---

<sup>①</sup> 参见向德平、章娟，《吉登斯时空观的现代意义》，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P29-31

的实际考虑，笔者提出“关系空间”的概念，旨在强调“空间是一种关系<sup>②</sup>”这一“现代性”命题。所谓“关系空间”，是区别于单纯的实体空间，指相对运动的个体<sup>③</sup>彼此间相互并存、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状态。需要明确的是，首先，关系空间是指以实体空间（个体）为核心，向内凝聚、向外释放能量或资源的能力；其次，关系空间亦指以客观的个体存在（实体空间）为基础，与其他个体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程度及范围。在此意义上，个体在空间中并不是表现出独立性，“空间是社会的表现(expression)，而不是仅作为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 (Castells, 1992)”，特别是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空间是“流动的”(The Space of Flows)，它关系到资源的占有、支配以及资本的形成。换言之，在“流动的”的现代社区生活中，关系作为一种变迁的空间形式与过程，导源于既定的社区结构及变迁环境，构成了整个社区架构的运作，其中包括了在社区结构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个体间为利益演出的相互冲突与相互策略的行动取向。同时，因运作亦承续自先前的社区结构的营造环境，其过程也影响着空间。

因此，这种“社会性”的“解构—重构”之空间逻辑，同时蕴含了关系空间在社区资源配置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及发展趋势，以及这些作用及趋势在社区研究中所呈现出的“关系—空间”的特殊性。在新制度主义兴起时，新制度主义学者们曾以“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来讨论社会行动、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它启示人们：经济、政治等行动都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中(Granovetter, 1985)。可见，新制度主义学者的经济学领域思考早已用“嵌入性”话语给予了社会学暗示——社区研究中“关系—空间”实践对理解社区现象的基础作用。

其实，在韦伯的“理解社会学”那里，我们亦可以找到新制度主义“嵌入性”解释的高度契合点——“以解释的方式理解社会行动，并将据此而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这种活动作出因果解释”，以此“洞察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韦伯, 2008: 11)”。据此，我们更应在社会学视角里去深入探析“关系空间”的社区意义。为了以尽可能简单清晰的方式来厘清关系空间在社区实践中的复杂性，及现实地呈现出“社会性”的“解构—重构”之空间逻辑，本研究将以珠三

---

② 此句式仿照了周雪光“产权是一束关系”的提法，见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③ 在某种层面上，集体也可看成是某一个体。

角一个非农化过程中的村庄 L 村作为个案，通过深入考察社区生活过程中的事件及联系，分析行动者的行为动机及价值取向等，以此来理解行动者的行为意义，并试图从中分析关系空间是如何在社区生活中实践的？以及在社区非农化变迁中它是如何通过个体间的互动来实现关系的建构及资源的配置？此过程又会是一个怎样的过程？

## 二、 研究介绍

本研究所选取的个案是广东省佛山市S区L村，采用的方法是社会科学质性研究法及人类学田野调查法。S区位于珠江三角洲中部，北临广州，S区境内大部分是江河冲积平原，经济发展迅速，为广东省综合改革试点地，现为佛山市主要的经济发展区。L村位于S区西北面，为一行政村，隶属于LC镇，距镇政府坐落地约7公里，近年，交通发展得比较好，临接325国道，北接佛山市一环路，南接一镇大道，村内主要道路约有26公里，大小桥梁22座。村辖区面积有3.1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868人，流动人口超过一万。辖下23个村民小组，村民主要姓梁、吴、何、邓，其中夹有小姓。现有耕地面积约1474亩，其中鱼塘面积1000亩。村内建有工业区两个，设有厂房、商铺仓库200多间。近年，村庄公共设施建设也比较迅速，村内建有商场、菜市场、商业步行街、幼儿园、小学、康乐中心、办公综合楼等。L村近年来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农村集体非农建设用地的入市流转，集得了大批发展建设资金。现本地村民几乎已脱离农业生产，大部分在镇上、市区或工业区上班，他们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两个，一为上班，二为股份分红，老年人主要收入就是靠分红。<sup>④</sup>

2007年10月—2008年7月，课题组成员先后5次进入L村进行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影像、档案、访谈等资料。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主要为对个案的深度访谈及研究者的田野调查笔记。在访谈方法上主要采用的是无结构型访谈(un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与半结构型访谈(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的结合。在访谈之初，完全抱着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对村庄村民生活变迁进行初步的概括性了解，在这阶段的访谈对象选择上采用了“方便性”原则

---

<sup>④</sup> 资料引自《L村调研访谈资料》，村支书语及相关档案资料，编号：A—08—M，C—19。

进行抽样，主要是通过熟人介绍对村民进行访谈。在初次访谈完后，进一步在文献阅读与讨论的基础上，开始细化研究问题，进而在后面的访谈中逐步聚焦问题。在后阶段的访谈对象选择上主要采用了“目的性”原则进行抽样，在质的研究中称之为“目的性抽样”或“理论性抽样”，即“按照研究的目的抽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Patton, 1990:169）”或“按照研究设计的理论指导进行抽样（Glasser&Strauss, 1967）”（转引自陈向明, 2000: 103）。本研究所选取的个案虽不具有量性研究似的“代表性”，但却具有了质性研究的“典型性”。典型性虽不是个案“再现”总体的性质（代表性），但却是个案集中体现某一类别现象的重要特性（王宁, 2002）。考虑到村庄非农化特性及外地人口对L的大量涌入，所以，在访谈对象中又增添了“外地人员”，主要选取的是长时间（一年以上）在L村居住的非L村户籍人员。

本文对资料的分析主要采用了质性研究的资料分析法，依据“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sup>⑤</sup>，努力去形成一种理论的建构。笔者通过深入了解村民社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及联系，依据研究的问题，本文下面的分析主要从如下层面展开：一是产生于社区实体空间的关系变迁，主要分析作为“共同体”社区的村庄格局变化，如何促使关系在社区中实践；二是社区生活，主要考察非农化的现代力量与传统力量的竞争融合，此中关系空间又是如何实践的？三是作为“共同体”中的个体行动，透过社区资源配置角度，分析关系空间在个体间相互冲突与相互策略的行动中是如何实现建构的？

### 三、 分析

#### （一）村庄格局：产生于实体空间上的关系实践

我们知道，空间的发展变化模型研究在西方城市社会学那里已形成了系统的

---

⑤ 扎根理论是一种研究的方法，或是一种质的研究的“风格”（Strauss 语，1987），是一个著名的建构理论的方法，于1967年由格拉斯和斯特劳斯提出。其主要操作程序如下：1）对资料进行逐级登录，从资料中产生概念；2）不断地对资料 and 概念进行比较，系统地询问与概念有关的生成性理论问题；3）发展理论性概念，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4）理论性抽样，系统地对资料进行编码；5）建构理论，力求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变异度和高度的整合性。详细说明参见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p332-338

理论学派，如城市空间的政治经济学派，如列斐伏尔（Lefebvre, H.）、罗维斯（Roweis, S.）、斯科特（Scott, A.）、索亚（Soja, E.）、哈威（Harvey, D.）等人；还如新韦伯主义学派等，其代表人有雷克斯（Rex, J.）、墨尔（Moore, R.）、帕尔（Pahl, R.）等。笔者在研究农村社区空间变迁时，受到了城市空间研究的极大启发，特别是在一个非农化过程的村庄社区里，表象于村庄格局的实体空间的变化，隐含着一种社区结构的变迁，它直接影响着关系在社区里的建构及运作。因而，在这一部分，笔者试图从实体层面的居住空间、公共空间<sup>⑥</sup>两方面来阐述其所呈现出来的关系空间实践。

### 1. 居住空间的分割：关系阶层化的凸显

(1) 村庄住宅区域的再布局。近 10 年来，L 村在布局与规划上可以说是焕然一新。10 年前村里大部分还是典型的珠三角“桑基”模式，居民的住宅都是建在鱼塘边上，有点类似于北方的逐水草而居，L 村可称之为逐“塘”而居，在塘边就形成一个住宅片区，“片区里就是一巷一巷的，巷与巷间挨得很近，开门就可见了。”（编号：A-06-W）从笔者在 L 村委办公室获得的 L 村规划资料中就可看出，现在的 L 村与村民们描述的 10 前的村庄有很大区别，“现在村里已做了完整的规划，禁止村民乱建乱开发，还划出了新的住宅区域，原有的区域也作了很大的改造。”“我们在新修的那个道路（湜海路）旁规划新区，宅基地。差不多有 198 间农民住宅用地。”（编号：A-08-M）随着近年 L 村交通的发展，以及土地的不断规划，有许多村户都在路边修建了新楼，新楼大都是两层以上，有的楼房还比较别致，俨然像是一栋栋小别墅。

虽然 L 村规划出了许多新住宅区，但还有大部分旧住宅区存在。在旧住宅区内，有的房屋也作了很大改造，有的还保持了原样，但房屋布局已改变了许多。“以前这里（指现在的住宅处）都是桑基鱼塘”，“村内的住宅排列基本是对位的，形成一定的序列但朝向并不是严格一致，房屋与房屋之间的间隔很小，朝自家的窗户望去都能观察到邻家生活场景”（编号：A-06-W）。而现在，据笔者深入 L

---

⑥ 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类似于哈贝马斯(Habermas,J.)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界定,在本研究中界定为两层意义,一为实体层面的公共空间,指人们可以自由进入交流的公共场所;二为抽象层面的公共空间,泛指在某种特定性空间内所产生的社会关联和关系交往结构等。

村旧住宅区的观察，许多房屋已做改造，且显得有点“封闭”，要步入邻家的屋子都显很麻烦；住宅单屋变成了楼屋，有的在“开始起房子的时候只起了一层的，后来有钱了就再起了一层，在他们（儿子）结婚的时候又在楼上搭了一个棚”（编号：A-06-W）；大部分屋子与新区的相比显得陈旧了许多，据调查，这些旧宅区的房屋大都是租给外地人住的，“他们（村民）有钱的都搬出去啦，有的是搬到新住宅区建新房了”，“不过这里的旧房出租是由村委统一管理的”，“说实话，还留在里面（旧住宅区）都是差一点的了，有钱的话，傻了还待在里面”。（编号：A-03-M）其实，村庄住宅区域的变迁与规划，无形中就促使了村庄社区结构的流动，进而无形中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化，且这种变化是很微妙的。犹如一个村民在访谈中所说：

问：如果生活中有困难，您会找谁帮忙呀？

答：找自己……

问：会不会找朋友、亲戚之类的

答：那当然有的啦，最终还不是找自己。譬如说我要建房子呀，我要找谁帮忙？现在建房子不同以前，怎么说，现在建房子都是靠自己，三十年前建房子还是要人帮忙，借钱，现在建房子还是靠自己，但没有绝对的

问：现在和亲戚、邻居间（交往）有没有变化呀？

答：现在邻居都变成外地人，都不知多麻烦，以前就环境好点，本地人还比较讲究卫生……就在我这条村那里，邻居我都不认识，因为没接触……

问：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多点时间（与邻家、亲戚）在一起？

答：年轻的时候多很多，现在（工作）各奔东西，以前一种思想一种行动……

（编号：A-07-M）

（2）居住市场的呈现。我们从L村可以看出，村庄住宅区域布局的类型差异无形中带来了村庄社区的“区隔”现象。同时，随着近年来珠三角农村地区的“乡村工业化”发展，带来了村中许多村民客观阶层位置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加速了社区的区隔化。乡村工业化必然会携带着市场进入到社区，可市场的形成一般滞后于工业化，它需要生产与消费的力量结合。在非农化过程中的L村社区，我们不仅看到了实体的市场、商场布局，同时，我们还发现并非完全工业化的L村里居然存在着居住市场，且渐呈普遍现象。单是住宅的出租早已是普遍现象，而房

屋的买卖也渐成气候。“村里很多外地人，村里的士多店也就主要是外来工租来开的，村民的出租屋主要也是提供给外地人的。”（编号：B-02）据村书记的介绍，当年搞规划修路，“在路两旁规划好新区，宅基地，L村村民若有钱的就可以购买新宅基地，……规划好了，就卖给我村的农民，那时候是600元/M<sup>2</sup>，……这样，修那条路村里是不是还有赚的钱。”（编号：A-08-M）可见，居住市场在村庄集体事务中已凸现端倪。

村民可“通过花钱，从规划的新区里面买地，修建房屋，交通又好，若（自己）不住的话，还可以租出去，这样也还可以赚钱……。”（编号：B-21-M）因居住市场的出现，这也就为那些在客观阶层位置上有优势的村民向较好住宅区域流动提供了可行路径，且在居住区域上逐渐形成了类租住民区、原住民区<sup>⑦</sup>、高档住民区的结构。

其实，在一个“非农化”的村社区中，居住空间已不只是一个栖身的场所，它还是居住者对于既定的社区结构及环境所做出的选择。村民在面对住宅区域的布局与规划时，他们会对于自身的客观阶层位置去选择相应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往对象以及生活方式；且居住市场的出现也为他们提供了可行的选择路径，然“个体在市场情景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又形成了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别（蔡禾、张应祥主编，2003：195）”，由此，“住房阶级”<sup>⑧</sup>便有了形成的基础。住房社会学研究认为，住宅的使用差异是人类社会隔离的指示器，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的阶级隔离、种族隔离、贫富隔离；消费社会学研究认为，居住空间会因社会阶层的分化而产生空间的分隔。可以说，住房社会学与消费社会学分别从居住空间分割与阶层关系问题间的两个方向做出了解释。在对L村居住空间的研究分析中，我们看出，居住空间的分割在客观实体上带来了村民关系阶层化趋势，而个体本身在社区结构中所处的阶层位置同样对他居住空间的选择产生了影响，两者结合，从

---

⑦ 这里统称那些还居住在旧住宅区里的原村村民“群”，因大部分旧房出租给外地人住，有的可能还不能形成区，但此处用“区”来指称这类“群”。

⑧ “住房阶级”是由雷克斯和墨尔在1967年出版的《种族、社区和冲突》一书中提出，雷克斯和墨尔通过对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一个内城区斯巴布鲁克（Sparkbrook）的住房与种族关系的经验研究，提出“住房阶级”理论。详细参见 Rex, J. & Moore, 1967, *Race, Community and Confli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而造成了社区关系阶层化的日益凸显。

## 2. 公共空间所呈现的传统与现代交织

在 L 村，“非农化”似乎使“乡土化”减淡了不少，且伴随着村庄经济的逐步对外开放，社区逐渐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公共交流空间。即使是表现得很传统的公共领域，它也富含了许多现代性意义。也许，正是由于一种传统性的本体需求难以改变，或者说它还占据着某种力量优势，村民才赋予它一些现代性意义，使之复兴，这样方能在日渐多元化的社区生活中找到平衡。村庄公共空间的传统与现代交织，具体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庄传统公共空间的演化与延伸；二是村庄现代新型公共空间的产生与拓展。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实体层面的传统公共空间的演化及延伸，带来了社区社会交往及联系的演化，而村民对这样的变化也有着自己的一种“本体性”解释。比如 L 村内梁姓重修宗祠，“大家也都会积极、热心捐钱”（编号：A-10-M）。重修后的祠堂并没有完全用来“拜祠”，而是以“XX 文化室”命名加以利用。“以前，祠堂是同族人进行集体祭祀、节日庆典、礼仪活动的场所，是一个家族势力的象征。但现在大多数的集体祭祀活动已经转移到墓园，而且参与集体祭祀的人数越来越少。”（编号：B-18-W）据笔者在祠堂内的观察，祠堂已成了老年人沟通交流与休闲娱乐的场所，许多老人在祠堂内打牌聊天，其正堂里还摆设了几张乒乓球桌，完全与庄严的神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于为何要重修祠堂，村民们认为这是一种祖宗的东西，不能没有。“当然有祠堂好一点，证明姓梁的人有个祖宗在这里，……本身祠堂烂了，如果不修，就是浪费了祖宗的祠堂，……我们社员就自己提出来要修祠堂。”（编号：A-09-W）

同时，在 L 村中，新型公共空间的产生与拓展，导致了新的社区交往与现代关系在社区中出现。“以前，村里市场啊都没有的，只有几个店铺，没有商场，没有市场，现在，有了商场，有了市场，在商业中心后面正在建一个 LC 镇最大的商场，到时很多商家都回到村里。……现在路也通了，还修了公园，康乐中心，……公园是开放的，本地人、外地人都可进去里面，康乐中心只是本地人能进。……”（编号：A-08-M）“以前每条村都会有街面，大家在街面聊天，现在没有啦，大家有时会来公园，公园外地人多，也有其他村的人……”（编号：A-07-M）“至于村里的大多年轻人，他们大都会去网吧玩电脑，去唱 K，或到镇

面上(玩)。”(编号: B-01-W)可见,新型社区公共空间的产生与拓展,为村民们提供了多重的互动场景,且因场景的不同,所带来的交往方式也不同。村民在新型公共空间结构里的关系实践不同于传统性的社区结构,其中蕴含了许多现代性逻辑。在那里,村民“各自有各自的朋友,相比以前,交往不是仅在一个圈子里……大家都可以是‘邻里’”(编号: B-02)。可以说,在相应的场景中,相应的关系被建构起来了;亦是说,相应的村庄格局,孕育相应的村庄关系。

## (二) 流动性与适应性: 关系空间在村庄生活中的实践逻辑

理论家鲍曼直言,自现代性萌芽之时起,它就一直是“流动性的”,流动的现代性已是毋需争辩的事实(鲍曼, 2002: 4);卡斯特亦说,经由不同的社会过程与技术变迁,浮现出了一个被流动支配的社会(Castells, 1992)。的确,流动,已是一种现代社会的主要表现,它正开始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过程。在一个“非农化”的社区生活中,妄不敢说它富有了多少“现代性”,但可坦言,它有着“流动性”,其明显的体现就在于社区生活中的关系空间流动。这里所谓的流动,是指在社区的生活实践中,个体所占据的物理上分开的位置之间,那些有目的的、计算的、可重复且可程序化的互动的集合。

熟知,“非农化”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带来了社区内生产与消费的分离,人们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来构建其社会联合以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亦如吉登斯所言的“时空分离”,它已远不同于“你耕田来我织布”式的社区生活。特别是“信息化”的涌入,更具有了“流动性”特色,它可携带着“革命性”的力量,这意味着它所带来的关系实践具有了变革性色彩;这也意味着“非农化”、“信息化”力量与“传统性”力量的竞争融合,最终达到彼此的“适应”。唯如此,在一个还同样富含传统要素的村庄社区里,关系空间方能在“流动”中变得适应,抑或流动的关系空间方能适应村庄社区生活。这只是一个抽象层面上的分析,如果将抽象意义的内容在实证中予以具体化,那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下文将以 L 村里的实地访谈资料支持来加以**描述**关系空间在“非农化”村庄生活中的“流动性”与“适应性”实践逻辑。

这里主要选取了具有“流动”特质的交通、物产、信息、组织网络,四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 1. 交通之流

L村现在交通四通发达，有公交及客运站点，进去外出很方便，可以说，交通带来空间流动是首要的。如30多岁的村民H姐所说，“现在到镇面上班都很方便的，交通好了，我下班后还可回家来与家人一起做饭、吃饭。反正先在市场上买好菜，（市场）又近，我下班回来也就直接做（饭），有时（孩子的）奶奶先做好……”（编号：B-22-W）。也据她说，她老公也是自己开车去工作，自己开了一间店，搞电焊装修，平常经常开着车去找业务。这只是截取了一个小小的生活场面，毋庸置疑，交通对社区生活带来的变革是难以用一点来加以概括的。笔者在村中观察时还发现，拥有私家小汽车的村民还占据了好一部分数目；除此，村内“摩的<sup>⑨</sup>”业也比较发达，需要外出到镇上或村内别的地方，都可随地叫一“摩的”搭载。可见，交通之流在村庄生活中已完全打破了传统上的地域界限。

## 2. 物产之流

也许在看到L村如此交通之流时，我们会感惊奇，这还是“村”么？的确，它不像村，但也不是城，也不像费孝通先生笔下的“小城镇”，正是它这种“亦村亦城”的特色才富有研究的意义。也许后面的描述更让人惊奇。

L村有自己的工业区，当然工业区的生产并不只是为村内居民服务的。据村书记所说，“工业区有80多家企业单位，都是家具为主，90%是家具，10%是其他，也有五金，其他方面也有……，现在LC镇家具行业很大，搞其他没有搞家具能赚到钱。”“这些家具也都销往全国各地，还有的出口，当然镇上也会零售，主要是批发，订单（销售）……”（编号：A-08-M）。显然，L村的生产并不是为直接满足自己的需求服务。在L村里，村民大都脱离了“家庭土地经营”的生产消费模式，生活所需主要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家里日常吃的、用的，大都是在市场上买。”（编号：B-22-W）笔者在村菜市场、肉市场调查发现，这些肉菜都是从别的地方运到L村里经营的，甚至其他村子的人都来L村肉菜市场批发进货到他们村卖。L村肉菜市场不仅满足了本村的日常需求消费，还辐射到了其他村子；它不仅满足了本村村民的日常需求消费，还满足L村外地人口的日常需求消费。在这条物流链上，我们不单看到的是物产的流动，还看到了围绕着这条链形成的

---

<sup>⑨</sup> 一种习惯性称呼，就是“摩托车的士”，一般是外地人以此为职业在村里谋生。

人、物、地域间的联系之流。从村民那里了解到，以前村民家庭还有种地、“耕塘”（养鱼），自家可以满足这些日常需要，也不像现在“要在市场上跟许多人打交道，这也是必然的”（编号：B-22-W）。显然，物流所具有的“流动”并不仅限于“物”，它已延伸到村庄社区的微观生活。

### 3. 信息之流

若不是深入实际，很难想象“信息化”对村庄生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信息，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空间”，因而，它所形成的流动也是无形的，不像交通之流与物产之流。对于现代城市社会生活来说，信息社会已成根本趋势，现在已经是常识了。我们知道，信息科技的历史革命，犹如奠基于能源的工业革命，它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改变了社会的机理。信息化加速了“时空分离”，它可以说是从微观上彻底消除了空间的固化与隔离，加速了空间流动，促使流动空间的形成，亦所谓“世界是平的<sup>⑩</sup>”。我们过去所说的“宁静”村庄，同样逃避不了信息化的变革性影响。非农化必然带来信息化，信息化促使空间流动，从而影响着村庄生活的方方面面。村庄社区生活在信息之流的推动下，也避免不了流动空间的形成。从下面对L村村民的生活访谈中就可看出：

问：那十年前您会和哪些人经常来往？现在呢？

答：以前，首先肯定是家人啦，这不用多说，其次就是亲戚，我以前是很喜欢去我妹妹家，或是婶婶家，聊聊天什么的。如果他们有什么不舒服或是困难，就会去问候一下他们或是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就帮咯。现在，就很少了，毕竟时间不太合。现在很多时候都是打电话什么的，互相问候问候。现在有电话，方便多了，不管是与家人，还是与亲戚，电话联系起来的确很好，与谁都可以联系。……对了，十年前和邻居的交往应该比亲戚还要多，我们和隔壁的邻居相处得都非常的好，大家都有说有笑的。

问：那现在呢？

答：现在都差不多了，最多肯定是家人啦。反正平时大多靠电话联系的多。

（编号：A-06-W）

---

<sup>⑩</sup> 美国新闻作者弗里德曼在他名作《世界是平的》里用“世界是平的”经典地概括了当今互联网时代、信息化的发展对整个世界发展的作用。参见(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问：如果聊天的话，会在那里？

答：现在探访的很少，现在通信发达，有时候有事问，直接打电话，解决就这么简单，连信都不用写。

……

问：为什么现在大家不在街面交流啦？

答：现在街面也很少了，……现在有电视，连剧院都不会去，现在剧院外地人多过本地人

问：本地人怎么不去看呀？

答：家里有电视，又不会普通话。看电视什么都知道啦，国家大事之类的。

（编号：A-07-M）

在入户进行访谈时，我们发现几乎每家都有了电视机，老年人平时还用收音机来听广播，有的家里还安装上了网络宽带，新媒体也开始进入了村庄。许多村民都认为“现在的交往关系比以前好，交往也多了”（编号：A-05-M）。可见，信息化的力量已渗入村庄生活的细微之处。然从他们的谈话口吻里可看出，对于这样的信息之流带来的空间流动，他们表现得很乐意接受并适应了这样的变化。

#### 4. 组织网络

若说信息带来的是无形流动，那么组织网络带来的就是隐形流动了。其实，信息化本身也就促使了组织网络的形成。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宗族形成了组织的核心，且有着一种由上至下的秩序安排。然在非农化进程中的村庄社区，宗族固然存在，但亦不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扮演的只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组织网络完全不同于传统性宗族从上到下的垂直关系，而是一种水平关系，每一个节点都有着自主性，节点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而改变策略，以使重塑关系组合。组织网络，即是一种社区流动空间的代表。在组织网络中的个体、资源、信息、决策，都是以一种流动状态存在。宗族也唯适应这种流动状态方能在村庄非农化过程中存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非农化”村庄社区里，宗族非但没有所想象的减弱甚至消亡，它反而变得那么不可替代甚至复兴。关键就在于组织网络的形成，且宗族适应了它所隐含的那种流动特性。下面以L村里重修宗祠为例加以简单描

述<sup>⑪</sup>：

L村梁姓重修宗祠这一很传统的事件，它从提出到修葺完善，都不是由宗族或“长房<sup>⑫</sup>”决定的，而是由“觉得可以修，修宗祠好”（编号：A-10-M）这些人共同决定。这些人之中，有“长房”，有老板，有同族村民。祠堂被损坏得很严重，开始是由部分村民提出来重修祠堂，然后就向村小组长反映，找“长房”们商量，大家都觉得可以修，修了之后还可以做文化活动室，可问题是没钱，需要十几二十万，于是热心的人就开始找些同族的老板商量，说是“祖宗的东西，不能让它坏了”（编号：A-09-W），老板也表示同意。于是就组成了一个修宗祠的组织网络，其中节点包括了热心村民、长房、村小组长、老板。老板通过自己的网络，打电话找人，召集一些同姓老板，像拉赞助一样，筹了一部分钱。同时，也贴告示，打电话到一家一户，召集村民们捐，不过捐得很少，“村民有捐几十块、一百块的都有，基本上很少人说不捐的。”（编号：A-10-M）共捐了三、四次才把钱筹得差不多了，然后就开始动手修。热心村民又通过自己的网络找到比较信得过的工匠来修，有的村民也自愿负责监工。修葺完后，他们还搞庆贺，由老板出钱，还邀请了村委领导及另外一个村同宗的人来参加。整个过程似乎就在不知不觉中已完成了，其实，在之中，组织网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它带来了个体、资源、信息、决策的流动与整合。同时，像宗祠这样象征着宗族式的传统力量在此过程中也得到重兴。

### （三）资源配置的有限排他：关系空间在个体行动中的实践逻辑

在这部分笔者将分析视角从村庄生活转向更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前面也谈到，村庄关系空间的形式与过程，导源于既定的社区结构及变迁环境，然而，在分析村庄关系空间的实践时，我们不能忽视社区结构中占据不同位置的个体间资源配置的相互策略。个体行动的逻辑基点就是在于对资源的占有，因而，在个体互动中，对资源的占有及支配是其关键，确切来说，是对稀有资源的占有及支配。

---

⑪ 限于篇幅，以下是根据《L村调研访谈资料》里众多访谈对象的关于修宗祠的整理资料联结转述而成，并无虚构。

⑫ 长房：在L村里指同姓里面最大或最老的那一辈份，有的姓里面是一个人辈份最大，那么这个人就是长房；有的姓氏里有好几个人同辈，那么这几个人就组成长房，但还是里面最老的那人说话比较有分量。

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费孝通先生用“差序格局”作出了形象的描述，他认为，中国社会中的亲属关系就是一种丢石头所形成的同心圆波纹性质；这个波纹网络，有一个中心，那就是自己，且在这个格局中，公与私是相对的，向内看就是公，向外看就是私，遵循的是一种“特殊主义”的道德维系。（费孝通，1998：24-36）后来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关系时开始修正“差序格局”，提出了“工具性差序格局”（李沛良，1993）、“朋友式关系”和“同志式关系”（Ezra, 1965）等概念解释。而实际上，中国乡土社会里的“差序格局”并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格局，或一种伦理道德的模式，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差序格局”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社会中稀缺资源进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那些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资源都是按照血缘、地缘这两个基础来进行分配的。<sup>⑬</sup>也正是这样，个体在“差序”中才形成了一种对血缘、地缘的空间依赖。也许，从此角度入手去理解“差序格局”，方能更好地解释个体行动在村庄非农化过程中所体现的空间实践逻辑——行动的策略取向。

“非农化”是一个“传统—现代”的结合体，在前几部分的分析已多有反映，在此不予以赘述。然作为个体层面上的“人”，似乎还没有加以深入考究。“在实际利益上，大家都是计算好的，若有利一点，我并不是总排斥他……不灵活，很吃亏的，现在这种社会。”（编号：B-17）L村村民的一句现实话语，既引起了笔者的深入思考，也反映了村民在关系建构中的行动策略。在L村中，有许多这样类似的例子，有关系到集体的，也有关系到个人的。梁姓重修宗祠后，需得请一个人来日常看管，按常理，所请人应该是本族内的人，可是在开始之时，梁姓宗祠却是一位外地人看管，据负责人所说，“每个月300块，很少了，虽然看管也没啥事做，也就平时打扫、维护一下祠堂，收一下租金（祠堂旁建有一出租屋），但担心一是本村人可能不愿做，二是说实在，所给的工资的确是低，本村人他去干点别的可能还更有赚的，也没办法，祠堂又没啥收入，就是靠那出租屋来养着……”（编号：A-10-M）现在，看管人员又变成了本族内人，工资也从300涨到了400元。对此，那负责人是这样解释的：

问：那现在呢？平时谁来维护的？

---

<sup>⑬</sup> 参见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P22

答：就是中间在打麻将的阿姨，她就负责看祠堂，她老公就有时帮忙收一下租什么的。

问：怎么找到她的？

答：呵呵... 这个就不方便说了... 关键是有责任心就好了... 毕竟工资不算太高，所以对于人的要求也不能太高了，去年 300 块，今年升到了 400 块.... 也算是积点德吧。况且本族人还是比较好一点。（编号：A-10-M）

这虽只是小小祠堂看管员的调配，但里面却涉及了对资源的配置及占有。从祠堂负责人的逻辑里，我们不难看出，在决策中不乏计算与策略，工资低了就留给外地人，但后又觉得，看管本身也没啥事做，是一件清闲差事，即使工资低也有划算的，于是又调配到本族姓的人，工资还从 300 涨到了 400，至于为什么找到现在那看管员，“不便说”，只怕里面还有另一层计算在内，那计算可能也就关系到他本人了。不难看出，祠堂负责人所做出的决策有着“差序”的特质，但也并不是一定遵循“差序”，他自己亦有所取向，无论取向何方，都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有条件的”。这种变通式的乡土原则，可以说是个体关系交际中特有的方式。

L村在建一工业区时，需要占用村民的自产地与“坟头地”<sup>⑭</sup>，所以得让村民把坟迁走。在农村，“迁坟就会动风水，动祖宗的，大家认为是不吉利的事。”（编号：A-08-M）刚开始迁，许多村民都进行反对，虽然工业区建起来后，他们都可以从中得到股份收入，但他们还是要挑战“权威”，于是，村委也没办法，只得迁一个坟给 300 元，“他（村民）划算了，就愿意迁了。”（编号：A-08-M）

以上可以说是一列个人决策关系到集体的具体案例，那么，在个人决策关系到个人时，关系空间在个体行动中又是如何实践的呢？

L村有许多外地工人给本地老板做工，这就牵涉到许多劳与资的问题，外地人与本地人的问题，其实本质还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本地人与外地人在社区中所处的客观位置的不同，必然带来他们在相互互动中的冲突与计算。然他们毕竟也还是处在一个“共同体”社区内，彼此间的冲突与计算也都鉴于利益的考虑——一种实用与目的理性选择。也即说，个体间形成或既有的关系互动，在资源

---

<sup>⑭</sup> 坟头地，即安葬死人的地方，墓地。

的配置上有一种选择性，在“我”的策略计算里，“我”并非是总排“他”的，如上所说，行动的策略取向是有限的。在对 L 村一外来工的访谈中就可明显看出：（鉴于担心造成随意截取或歪曲受访者的客观逻辑，恕笔者在此大段摘抄原话录音资料）

问：你们跟本地人多不多来往的？

答：我们跟本地人很少打交道的。反正自己出来打工的，觉得好像很多本地人瞧不起出来打工的

问：是你觉得是这样？

答：很多人都觉得是这样，本地人瞧不起外地的。

问：有什么表现呢？

答：好像看不起外地人啊，本地人。反正，不是说感觉，反正就感觉是这样。就好像说，我进这个厂，我做到不开心的时候，a...我心里面不高兴这个工资，好像我心里面在想，不止这一点点，好像那个，单价低了，（就）辞工不做，这些老板对你的，好像就是，你一出了这个厂，还没收工资，（无工资可拿），你说这些老板是什么老板……。不是说我不干，而是你那个单价低了，你也不跟我了解（不跟我讲清楚），我肯定，我心里面不舒服，好像我们做得辛辛苦苦，而只给这个（低的）单价，我找不到钱（挣不了多少钱），我就肯定，我就辞工不做，不做，我一停了工，a...我里面还有（认识的）师傅啊、朋友啊，我就去跟他们聊一下天，（我就说），我的工资他（老板）还没给我。好像我今天出来，后天就跟那些朋友啊、师傅啊说句话，（厂或老板）都不给你进，说“不要进，不要进”。反正就让你在门口，反正你结工资，你就等一下（就只得在门口等）。你说这些老板，a...人家不是说不给你干，a...人家说，你（老板）那个单价低了，好像，现在呢，生活费也贵是不是。好像做一二千块钱，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工资应不只这一点点，是不是，你（老板）单价低了，比如是计件，我拼命的干还赚不到钱（相应的，理想的工资）。a...在工资上（老板）又不跟我反映，又不跟我说（商量），这样对待，（我）肯定不满意啦。好像现在我刚出的这个厂，我那个时候有想，（觉得）那老板（瞧不起你），a...就我就不进了。好像没你这个厂，我到其他厂也照做。我也只是暂时在你那里，先有个生活着落。

……

问：为什们你们外地人一般好像都是做生产工人，本地村民都是做管理人员。好像不公平哦，你觉得怎么样？

答：我不知道怎样说，（笑……）各自有各自的需要吧，说实话，我们外地人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发展。

问：不过好像工资都差不多哦？

答：有些厂的，做管理人员的还没有那个（生产工人），那么多工资，只是他比较轻松一点。

（编号：A-03-M）

其实，若仿用加拿大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M. McLuhan, 1964) “媒体本身就是信息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这一经典名言，我们亦可以说，“关系本身就是资源”。如此，个体在建构关系的过程中，已把关系本身当作一种资源来配置了。我们说，对资源的占有及支配是个体行动的逻辑基点，当然其中也包括了关系的占有及支配，也即关系的实践。那么，针对 L 村里所体现出的个体行动取向，我们就更不难理解关系空间在个体互动中所呈现出来的“对资源配置的有限排他”逻辑。

这种“对资源配置的有限排他”，并不同于帕森斯 (T. Parsons, 1951: 82) 所提出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两分法，（即特殊主义为“凭借与行为之属性的特殊关系而认定对象身上的价值至上性”，普遍主义为“独立于行为者与对象在身上的特殊关系”<sup>⑮</sup>），它可以是“亦‘特殊’亦‘普遍’”。或换句话说，个体间互动的策略取向并不是在于“他们之间特殊关系的依赖与否”，而是在于“他们之间资源配置的有利与否”。在这个意义上，“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是相对的，并不是两分的，笔者姑且也把之叫做“有限排他”的。如此，若用丘吉尔的话来形容也并不过分：“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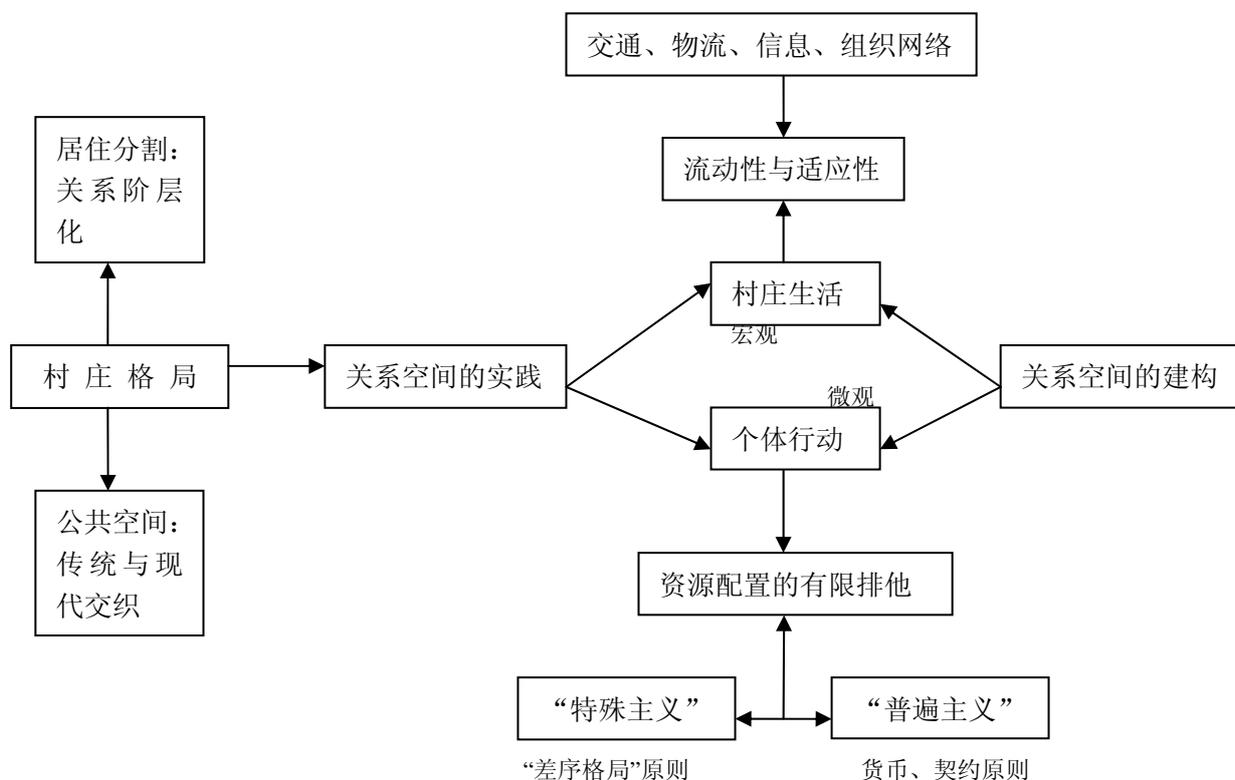
---

<sup>⑮</sup> 参见 Parsons & E.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82 转引自郑也夫，《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载《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4期，p110

#### 四、 关系空间的实践与建构：一个流动式的变通过程

如前所分析，在非农化进程中的村庄社区，“流动性”充斥其间。流动的，必然意味着是动态的。面对这一个动态的社区空间形式与过程，我们又不可能将其局限于实质物理上的界定，如果那样，在其界定表面所发生的那些，只能如卡斯特的所说，谓之“空间呈现 (spatial manifestation)” (Castells, 1992)，那么，在研究社区时，我们就难以理解社区的具体运作。由此，笔者运用了“关系空间”这一概念来研究社区，强调“空间是一种关系”，不能忽视空间的“社会性”特质。然而，又如何使其抽象的概念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中呢？这就需要把研究放在社区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去，从具体生活事件中去寻求抽象的逻辑。基于此，通过对 L 村的调查研究，笔者以为，关系空间在非农化村庄里的实践与建构，导源于既定的社区结构及变迁环境；因“非农化”、“信息化”力量与“传统性”力量的竞争融合，它在宏观的社区生活层面呈现出了流动性与适应性的实践逻辑；透过资源配置的角度，它在微观的个体行动中呈现出了“有限排他”的实践逻辑。如图 1：

图 1：关系空间的实践与建构



当然，这两种逻辑并不能完全反映关系空间在村庄非农化过程中的实践与建构，这只是一种分析后的理想化概括。关系空间作为一种流动的状态存在，其难以用静态标准对之作出界定。基于关系空间的这种流动特质，笔者在分析时试图表明，关系空间在社区实际的实践与建构中有着丰富复杂的形式与过程，笔者虽然把之放在宏观层面的村庄生活与微观层面的个体行动中去呈现出它的实践逻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在其“流动性”特质中所形成的变通原则以及产生的动态效果。

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个流动式的变通过程，才使得“非农化”村庄在“传统—现代”的交织过程中保持一种均衡状态。如图 1 显示，从横向看，村庄格局为关系的建构场景，其隐含着社区的结构特点，关系空间通过村庄的社区生活与个体互动来实现其实践与建构，实践的过程也即建构的过程；从纵向来看，关系空间的实践与建构，在村庄生活层面，因受其具有高流动性的交通、物流、信息、组织网络等因素影响，促使了流动空间的形成，在个体行动层面，因占据不同位置的个体间资源配置的相互策略，形成了“资源配置的有限排他”策略取向，区别

于费氏“差序格局”下的“特殊主义”的道德维系，也不同于帕氏“模式变项”中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二元对立。可见，从横向到纵向，无论是“流动、适应”，还是“有限排他”，这些都可说是一种变通，或者说是在流动中保持均衡的一种策略。

## 五、 结论

本研究把“空间”概念引入了乡村社区关系变迁研究，并提出“关系空间”的概念思路，并以一个珠三角非农化村庄 L 村作为个案，试图对村庄非农化过程中所呈现的关系状态作出一种新的解释，探索背后所隐藏的实践逻辑，呈现关系空间的建构过程。

### （一）

文章通过对田野调查资料的质性分析，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理解村庄非农化过程中的关系空间：

I、村庄格局。关系空间是在实体空间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表象于村庄格局的实体空间的变化，必影响着关系在村庄里的建构及运作。特别是村庄居住空间分割以及居住市场的呈现，带来了关系阶层化的日益凸显；除此，村庄公共空间所表象的传统与现代的交织，造成了一种“泛邻里化”的倾向，带动了村庄关系的建构。这些也都为村庄生活及个体互动奠定了结构性基础。

II、村庄生活。在村庄生活这样一个相对宏观的视角层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关系空间在非农化社区生活中所富含的“流动性”特点，交通之流、物产之流、信息之流、组织网络等在村庄生活中的出现，形成了村庄流动空间，且与村庄传统形成了彼此交融，使得村庄的某些传统性得以延续。

III、个体行动。要全面理解关系空间，个体作为关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不容忽视。个体行动作为理解关系空间的一个微观层面视角，直接关系到村庄中人的行动选择及策略取向。在社区资源配置上，个体间的互动并没有严格遵循“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原则，亦不是严格按照“普遍主义”的货币、契约原则，它却遵循一种特有的乡土变通原则——有限排他。

### （二）

关系空间作为一个抽象性的概念提出，并不是难以在具体研究中得以验证，

它是以相对运动的、客观存在的个体为基础的，为此，个体的行为动机及价值取向等主观建构赋予了它更深刻的意义，即关系空间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过程。这是一个动态的变通过程，或者叫做一种对关系的经营建构过程，有着生产与再生产的形式。因此，本文采用了实践社会学(孙立平, 2002) 的视角，将一种实践状态的村庄“日常生活”作为其研究分析对象，把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如迪尔凯姆所说的静止的“集体表象”(E 迪尔凯姆, 2006)，并借助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分析手法，将个体行动作为村庄关系空间建构的一个重要基础来加以论述，以此深入洞察个体行动在村庄关系建构中的主观意义。基于此，关系空间在村庄非农化过程中的实践逻辑与建构过程可以从前所述的三个层面来加以认知：

I、关系空间的实践产生于实体空间的变迁。如村庄居住空间的分割带来的阶层化凸显；公共空间变迁带来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等。

II、因“非农化”、“信息化”力量与“传统”的竞争融合，关系空间在村庄社区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流动性”与“适应性”的实践逻辑。如村庄交通、物流、信息、组织网络等流动，与传统的交融重新建构了村庄空间。

III、作为“共同体”社区中的个体，在关系空间的实践与建构过程中，其行动的逻辑主要在于资源的占有及支配。因资源配置作为行动策略的主要考虑，所以，关系空间在个体行动中遵循了一种“有限排他”逻辑。如资料分析中的“祠堂看管员调配”、“村委与村民迁坟博弈”、“外来工择厂”等案例，都反映出了这种“有限排他”逻辑。

通过对关系空间在村庄非农化过程中的实践逻辑认知，本文还强调，在动态的社区“日常生活”变迁中，关系空间的实践与建构是一个流动式的变通过程。本文所提出的关系空间实践逻辑模式对理解社区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但并不意味着这是对动态的“日常生活”现象作出了一成不变的判断。当然，它还有着其可能的实证意义，以便日后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 参考文献：

(英)安东尼·吉登斯. 1998. 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 三联书店.
- (法)布迪厄. 2001. 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G]//包亚明,主编.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蔡禾、张应祥. 2003. 城市社会学: 理论与视野[G].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 陈向明. 2000.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 (法)E迪尔凯姆. 2006. 社会科学方法的准则[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费孝通. 1998.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法)亨利·列斐伏尔. 2003. 空间: 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G]//包亚明,主编. 现代性与空间生产.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 何雪松. 2006. 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J]. 社会(2).
- 李沛良. 1993. 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系概念与命题[G]//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所,编. 东西方社会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美)曼纽尔·卡斯特. 2006.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德)马克斯·韦伯. 2008. 社会科学方法论[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英)齐格蒙特·鲍曼. 2002. 流动的现代性[M]. 上海: 三联书店.
- 孙立平. 1996. “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 社会学研究(5).
- . 2002. 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5).
-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 2006.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王宁. 2002. 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J]. 社会学研究(5).
- 王逊. 1991. 实体空间和关系空间[J]. 怀化师专学报(6).
- 向德平、章娟. 2003. 吉登斯时空观的现代意义[J]. 哲学动态(8).
- 郑也夫. 1993.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J]. 社会学研究(4).
- 周雪光. 2005. “关系产权”: 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J]. 社会学研究(2).
- Castells, M. 1992 . The Space of Flows:A Theory Space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New Urba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 Ezra, F. V. 1965. "From Friendship to comradeship." China Quarterly 21 .
- Foucault, M. 1980. Question on Geography.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481-510.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lackwell, Oxford.
- Mcluhan · Marshall.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 Rex,J. & Moore, R.. 1967. Race,Community and Conflic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 Practical Logic of Relationship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Non-agriculture: A sociologic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 relationship in L village of Pearl River Delt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se of a village in Pearl River Delta, the point of this paper is to put forward the new concept of “relationship space” to interpret the “Non-agricultural change”. Relationship space is a framework of the operation of a rural community, derived from its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the action-oriented strategy of different individual for his own interest. Therefore, “relationship space” is a process of mobility alternative in the dynamic change of non-agricultural community, resulting in the change of physical space. At the social level, two types of logic—fluidity, flexibility — have supported its operation. In the individual level, it shows the logic of limi-exclusiveness in regard to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Key Words:** relationship space ; non-agricultural ; fluidity ; flexibility ; limi-exclusiveness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http://www.sociology.cass.cn)